

Dai Xie De Wan Ge

帶血的挽歌

——清代文人心態史

Qing Dai Wen Ren Xin Tai Shi

陈维昭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當我們把封建時代的歷史人物放在封建主義的範疇中去理解的時候，

我們的理解也許可以更富於歷史感。

而揭示歷史人物的文化心態以及這種文化心態所附屬的文化語境，

則是實現這種歷史感的重要途徑。

從文化心態，文化語境去關照歷史人物，我們則又可以發現另一景觀。

心理學與歷史學的融合，文藝學與現象學的融合，



是我們切入古代文人的歷史語境的入口。

古代歷史，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古代歷史，

是文獻中的歷史記錄，是古跡文物上的歷史印記。

也即是等待着我們去理解、解釋的歷史。

理解與解釋既不僅僅是對歷史材料的復制，也不是“六經注我”式的相對主義。

理解與解釋是借助歷史材料的中介。



將我們與歷史人物共同擁有的文化話語，從而與歷史人物對話、溝通。

史學教會我們審視歷史。

理解則引導我們設身處地，將心比心，暫時淡化我們的當代角色。

而選擇歷史人物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模式。

史學維度的引入，使我們能夠從宏觀整體上把握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本質和流向。

據限定義古代文人行為、思維、情感模式的歷史條件。



带血的挽歌

——清代文人心态史

陈维昭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带血的挽歌/陈维昭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5
(历代文人心态史丛书/陈桐生,刘怀荣主编)
ISBN 7-5434-4167-5

I . 带… II . 陈… III . 知识分子-研究-中国 IV . 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5008 号

书 名	带血的挽歌——清代文人心态史
作 者	陈维昭
责任编辑	郝建国
封面设计	刘 昕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润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45 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167-5/D·30
定 价	17.2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顺治朝文人心态	[5]
一 启蒙思潮	[11]
二 遗老的抉择	[18]
三 狂士金人瑞	[41]
四 名教与风流合一	[50]
第二章 康熙朝文人心态	[67]
一 历史的反思	[75]
二 科举人生	[92]
三 侍卫与狂生	[113]
第三章 雍乾时期文人心态	[121]
一 文治之功臣纪昀	[130]
二 乾嘉学风	[140]
三 独抒性灵	[142]
四 狂官与糊涂	[156]
五 重建人文精神	[167]
六 盛世悲音	[181]
第四章 嘉道时期文人心态	[196]

2 带血的挽歌

一 常州词派

| [199]

二 末世忧患

| [202]

绪 论

中国封建主义发展到了晚明，似乎走到了它的末世，不少敏感的人士已经产生了末世感。毛先舒称当时的社会风气为“末世风气”，他说：“末世风气险薄，笔舌专取刻挺自快，且借之为名高。吁，可怪也。”^①启蒙思想家唐甄说：“末世学者不纯，中无真得，好为大言，自信以为皋夔……”^②如果说，明清之际的有识之士是在“天崩地解”的现实面前产生末世感，那么，康雍乾盛世的末世感则显示出一种空前的深刻性。在盛世的表象中感受到末世，这种深刻的辩证表现出对于历史本质的洞察。

晚明以来的启蒙思潮是以反对思想上、文化上的专制主义为出发点的。随着启蒙思潮的深入人心，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封建专制主义似乎应该是处于穷途末路了。然而，既尚武功又重文治的处于北方的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打乱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多尔袞、康熙、雍正、乾隆等统治者又以超乎常人的文韬武略、统治权术乃至充沛精力，令晚明以来的日暮黄昏的专制主义死灰复燃，并将它推向极致。于是，中国历史至此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景观。

一方面，清代初、中期的极端专制主义使统治者的治国策略能够高效地实行到基层，大一统的统治创造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养民”的思想得到贯彻，这为经济的发展、繁荣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

① 《与洪昇书》。

② 《潜书·得师》。

文化上，专制主义可以有效地通过行政命令进行史书的修撰和大型图书的编纂，从而有利于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与流传，繁荣了文化事业，为文人提供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广阔场所。另一方面，封建专制主义的军事行动（如康熙的平定三藩、乾隆的十全武功）和文化活动是建立在丰裕的财政基础、强大的经济实力之上的，而这个财政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封建专制主义对经济领域的有力控制。由于这种控制是建立在专制主义的基础上，因而这种控制往往可以直接干预经济领域乃至随意破坏经济领域的自身秩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江南商贾，出资捐粮作为军饷，而朝廷则以提供盐引和让商人在一定程度上随意提高盐价作为回报，这无疑导致了盐市场的混乱。康熙、乾隆的南巡（各六次），给江南商贾造成了经济上的巨大灾难。在文化上，专制主义的文化事业自始至终贯穿着思想上的专制意识，《明史》的修撰、《四库全书》的编纂，始终以清统治者的政治利益为尺度进行取舍乃至篡改，与《四库全书》编纂活动同时进行的则是焚书，秦始皇以焚书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做法在清代初、中期得到了回响。这对于明朝以来的启蒙思潮来说是一次大反动。

一方面，康熙等皇帝强化其中央集权，多次对官场作风进行整顿，斥责虚浮的官场作风和学风，这种务实的思想与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的务实思想不谋而合。两者所面对的是大体相同的事实，即士林与官场人文精神的萎缩。另一方面，两者的目的则南辕北辙。清统治者的务实思想旨在改变官场作风，加强吏治，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机制注入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启蒙主义者则将“士—仕”阶层的玄谈空论看成是国家衰颓、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务实意味着重实践、重学习，在广泛的实践和学习中接受启蒙，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与习惯，这样的学习与实践活动如果能有效地在最大范围内展开，那么，专制主义文化基础也就被釜底抽薪了。

一方面，封建专制主义以“文字狱”为最直接的表征令不少知识分子噤若寒蝉，而修明史和编纂《四库全书》则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疏导策略，弱化了不少知识分子的压抑感，这种文化疏导的直接结果是《明史》与《四库全书》等的完成和以考据为特色的乾嘉学派的形成。另一方面，曾经沧海难为水，经过明中叶以来的启蒙思潮的洗礼之

后，反专制主义思想不仅没有熄灭，反而愈演愈烈，贯穿整个清代历史，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戴震、金圣叹、蒲松龄、纳兰性德、袁枚、黄景仁、郑板桥、曹雪芹、吴敬梓、龚自珍等人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从事相同的事业。

一方面，从多尔衮、康熙帝、雍正帝到乾隆帝，封建专制主义愈演愈烈，形成了“康雍乾盛世”，成为继西汉的文景盛世、唐朝的贞观盛世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另一方面，就在这个盛世正在逐步走向它的巅峰的同时，启蒙主义者则一再表达了一种末世感，从繁盛的表象看到了专制主义的致命创伤所在，从而为这个盛世唱出了一支无尽的挽歌，这支挽歌贯穿了整个清代。

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反封建成为中国大陆占主流地位的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研究、哲学史研究、文学史研究中，反封建始终是一个褒贬的尺度，同时，封建时代的历史人物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包括他们创作的作品）决定了20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必须对他们持肯定性的态度。于是，在“封建时代”与“进步性”的“矛盾”中，一种被普遍应用的折衷形式是，让封建时代的历史人物在某一范围、某种程度上超出封建主义的范围，从而成为一个反封建的人物。在这种观点看来，封建时代历史人物的进步性即是他的反封建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强调个体主体意识的同时，“当代意识”也成为最时髦的名词，它强烈地影响了80年代的历史研究。当代意识、主体意识的强调，使人们找到了“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倚恃，以致有时候在不经意之中把历史人物的文化语境忽略了。在这类当代意识、主体意识的观照下，历史人物又显现出另一种形象。

当我们把封建时代的历史人物放在封建主义的范畴中去理解的时候，我们的理解也许可以更富于历史感。而揭示历史人物的文化心态以及这种文化心态所附丽的文化语境，则是实现这种历史感的重要途径。从文化心态、文化语境去观照历史人物，我们则又可以发现另一种景观。

心理学与历史学的融合、文艺学与现象学的融合，是我们切入古代文人的历史语境的入口。古代历史，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古代历史，

是文献中的历史记录，是古迹文物上的历史印记，也即是等待着我们
去理解、解释的历史。理解与解释既不仅仅是对历史材料的复制，也
不是“六经注我”式的相对主义。理解与解释是借助历史材料的中
介，运用我们与历史人物共同拥有的文化话语，从而与历史人物对
话、沟通。历史学教会我们尊重历史，心理学则引导我们设身处地、
将心比心、暂时淡化我们的当代角色，从而体悟历史人物的行为方式
和思维模式。历史学维度的引入，使我们能够从宏观整体上把握中国
历史、中国文化的本质和流向，把握限定着古代文人行为、思维、情
感模式的历史条件。而心理学维度的引入，则引导着我们去关注古代
文人的价值选择乃至情感、个性对于历史的塑造作用。

第一章 顺治朝文人心态

清朝统治集团尽管以武力统一了具有博大文化底蕴的中国，但是，它对自身的文化层次有较为清醒的估计，这使它能够发现中华文化的长处，也使它能够早在努尔哈赤时代便认识到中国封建统治机制的广泛的社会基础，认识到知识分子在封建统治机制中的不容忽视的功能。今天的读者窥视清代文人遭遇的时候，首先是为文字狱的腥风血雨覆盖得近于窒息，以为清代文人时刻生活在随时都可能掉脑袋的危机之中。事实上，困扰着清代文人的已经不是如何摆脱“八媚九儒十丐”的低贱社会地位的问题，而是如何自由表达思想实现自身价值，学而优则仕的问题。顺治三年即已开科取士，这一点，决定了清代文人在社会中的优越地位。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在这个由异族统治的时代，文人也可以与明代等由汉人统治的时代的士子一样，经由科举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而获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无疑是清朝统治得以巩固、持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元代初期文人一样，清初的文人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的贵族统治者将会采取怎样的文化政策。与元代初年蒙古贵族统治者一样，清初满族贵族统治者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承传者——知识分子，如何处理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双方的，选择是双向的。清朝统治者比元朝统治者高明的一点在于他们早在入主中原之前，就懂得汉族知识分子是汉族文化的承传者，是中原的民众基础。

像元朝统治者那样实行强硬的统治手段，依靠暴力，可以暂时征服汉族的民众，却不能使其帝业长久，统治中国不足百年就被推翻。清朝统治者采用了以汉制汉的策略，其结果是汉族被征服了，而清朝统治者则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汉化了，康熙、雍正、乾隆被汉族文化征服了，清朝不仅有了二百多年的帝业，而且创造了盛唐以来的又一个盛世——康雍乾盛世。

实际上，早在明末的王朝更替、中原涂炭之前，早在清兵的铁蹄踏破山海关之前，将于1644年之后在中国大地上实行的文化政策，就已经在努尔哈赤的脑海中萌芽，经过皇太极、多尔袞、顺治帝，这些文化政策一以贯之，至康熙朝，便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文化政策，文人便依照自己的文化惯性，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然而，入主中原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意识到汉族人民并没有从心理上认可这个异族的征服者。一方面，这其中有满洲贵族原有生产关系落后的因素。顺治初年，清政府出于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在顺天、保定、太原等地进行圈地运动，在圈占地中实行农奴制和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被圈占地原有的农民遂沦落为农奴制和奴隶制下的农奴、奴隶，原有的封建主义的自然经济和租佃关系被破坏了，农民的人身自由受到更为严厉的钳制，这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无疑是一种倒退。很多被圈占地的农民纷纷逃离被圈占地区，顺治三年，“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①。一些沦为农奴的农民，在无法逃离圈占地的情况下，忍受不了农奴主的钳制，走上了自尽的绝路，朱之弼上疏说：“臣见八旗仆婢，每岁报部自尽者，不下二千人。”^②于是，清政府颁布了严厉的法令以防止农奴的逃离。这无疑加剧了农奴主与农奴之间的矛盾。圈地运动激化了汉族民众的强烈不满情绪。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在征服江南的过程中，受到了汉族官兵、民众的顽强抵抗，这激发了清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和借故炫耀其征服者的淫威。

胜利的征服者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倚恃其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且在生活方式上处处想证明自己的征服者的角色，将其在关外的“祖

① 《顺治实录》卷二十六。

② 转引自《郎潜纪闻》三笔卷二。

制”、“旧章”强行在关内推行。摄政王多尔衮于顺治二年挥兵南下，攻占南京，推行剃发令，强迫南京的投降官吏军民从发式和服饰上采用满族的惯例。剃发令颁发后，限定京城内外、直隶各省的汉人在十天之内尽行剃发，借故违抗者，从严处置。顺治帝上谕：“该地方官若有为此事渎进表章，欲将朕已定地方仍存明制，不遵本朝制度者，杀无赦。”^①将“明制”和“本朝制度”相提并论，表明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是表明一种民族文化征服。

在清朝统治者借故显耀其征服者的淫威上，发生于顺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场案和发生于顺治十八年的金圣叹“哭庙案”就是典型的例子。清初多次发生科场案，即科场考官、考生作弊而被诛杀、加刑的案件。顺天、江南、河南、山东、山西等处均有发生。其中以顺天、江南两闹最为典型。顺治十四年丁酉十月，给事中任克溥参奏中式举人陆其贤，说他协同科臣严貽吉用银三千两贿赂考试官李振邳、张我朴，得中举人。皇帝旨下，将李振邳、张我朴、严貽吉等五人与举人田耜、邬作霖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一律流徙尚阳堡。举人王树德、陆庆曾、孙暘等二十余人本定绞，第二年四月，诏从宽免死，各责四十板流放尚阳堡，家产籍没，父母妻子兄弟一同流放。

江南科场案发生于顺治十四年丁酉十一月。给事中阴应节参奏江南主考方猷等因考生方章钺与他同是桐城人，故作弊而取为举人。一年后，主考方猷、副主考钱开宗（著名戏曲家洪昇的表丈）被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举人方章钺等俱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妻子兄弟一同流徙宁古塔。

科场关节的弊病，在明代已非常严重，既然熟读《四书》、《五经》朱子传注，熟谙八股文法就可以中举人、成进士，于是，人人都觉得自己具备了中举人、成进士的技能，能否中式则看考官的眼光、趣味如何；既然中举人、成进士可以给人带来荣华富贵，那么，人们就敢于花大本钱、冒大风险去行贿考官。然而明代对科场作弊者的处罚只是革除官职和举人资格，而清初的科场案则是草菅人命，不仅当事者、直接相关者被砍头，而且父母妻子兄弟叔侄连坐而同科。科场

^① 蒋良骥：《东华录》卷五。

作弊者“罪有甚于大逆”^①。清廷的这种严厉处罚是别有用心的，因为它并不是依据某些相对客观的法律条文去执行处罚，而是依据某种政治意图，杀鸡儆猴，具体的矛头指向江南士子。对顺天闹作弊案犯，法官拟罪时从重，而皇帝却特旨改轻发落；而对于江南闹的案犯，皇帝特旨从重，考官全部处死，两主考、十八房考的妻子都籍没入官，父母兄弟都被牵连。北闹流人被流放到离京师三千里的尚阳堡，而南闹流人则被流放到离京七八千里之遥的宁古塔。清廷这种做法背后的政治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以科场案为借口，以血腥恐吓、儆戒江南士人。这既是对江南士子的威胁，也是对江南士子的清算。在清军入关、南下的过程中，江南义师大多由江南文士所鼓动。统一中国之后，清廷对此一直怀恨在心。科场案、奏销案、哭庙案等从法律的角度看，过于严厉，无辜被牵连者因此而断送了前途；但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则清廷的严惩也是事出有因的。

在南闹科场案中，有一个典型的无辜牺牲者，他的冤酷，“审之诸公，知而怜之；都中士大夫，知而怜之；天下读书人，知而怜之”^②，他就是著名诗人、江南才子吴兆骞。吴兆骞参加顺治十四年丁酉南闹试，由于主考官及个别考生被发现作弊，结果清廷于顺治十五年三月下令对同一科中举者进行复试。而复试的考场气氛则宛如刑场，“试官罗列侦察，堂下列武士，银铛而外，黄铜之夹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③。而接受复试的举人则像一个个犯人，“每举人一名，命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与试者皆惴惴其栗，几不能下笔”^④。在这种气氛之中参加考试，考生显然不能发挥其正常水平，结果吴兆骞考不出正常水平，据说是当时吴兆骞刚好生病。有人则说是吴兆骞故意交了白卷，他说：“焉有吴兆骞而以一举人行贿者乎！”^⑤结果，吴兆骞被当成是无才而行贿者被免去举人，重责四十板，父母妻子并流徙到宁古塔。

① 孟森：《科场案》，《心史丛刊》初集。

② 吴晋锡：《与兆骞书》。

③ 李延年：《鹤征录》。

④ 王应奎：《柳南随笔》。

⑤ 《吉林通志·寓贤传》。

吴兆骞的冤案在当时的士林引起了很大的震撼，吴伟业、顾贞观、纳兰性德等都深受震动并深表同情。

这种高压政策显然并不高明，它的后果适得其反，满汉民族矛盾的加剧只能意味着清统治者并未获得其统治的稳固基础。

清朝统治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很快就将民族征服色彩淡化，而以敞开的胸怀容纳汉族士人阶层，尤其是名士阶层。

早在天聪三年八月，皇太极便有上谕：“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①同年九月，即举行考试，对成绩优异者给予“赏缎”、“赏布”、“免二丁差徭”等不同的奖励。

当然，清朝贵族集团也不是一开始就抓住了以汉制汉的思路。早在入关后的多尔袞统治时期，这位以武力征服中原的游牧民族的大贵族，依然保持其武力征服的惯性，将汉族文化纳入满族文化模式之中，结果激起了强烈的反抗情绪。

在关外满族统治者对于汉族知识分子文化政策形成的过程中，有一个汉族知识分子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个人物就是后来成为清朝开国宰辅的范文程。范文程是宋参知政事范仲淹之后，其曾祖父范颺是正德丁丑进士，累官至兵部尚书，后因触犯奸相严嵩而被罢官。范文程少沉毅，读书通大义，十八岁时补弟子员。努尔哈赤天命三年（1618）定抚顺时，范文程归顺。从此跟随努尔哈赤定辽阳、攻平西、下广宁。皇太极嗣位后，范文程成为智囊人物，并立下赫赫战功。天聪四年（1630），被授为秘书院大学士。后跟随皇太极平旅顺、取平岛、征高丽、服蒙古。国家的重要决策都要范文程参议。

1644年顺治皇帝登位，李自成攻入燕京。范文程认为，对李自成可以一战而破，但用兵不是争天下的上策。他说：“好生者，天地之德；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施，欲统一区夏，非义安百姓不可。”^②又上书数百言给摄政王多尔袞，认为中原遭乱，人民思择令主。主张任贤以抚众，任用汉族人中的贤能者，

① 《太宗实录》卷五。

② 钱仪吉：《碑传集》一。

提拔德高望重者入朝，让他们献计献策。入关之后，范文程安抚子遗，起用废官，搜求明朝隐逸之士，征考文献。李果的《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传》称：“公志在安民，在军首戒嗜杀，汲引人材，保全善类，如恐不及。”清朝平定中原之后，范文程向皇帝进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宜广其途以搜之。乙酉、丙戌通籍者皆江北士子，请于丙戌、丁亥再行乡会试。”“士为秀民”，这是范文程对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这表现出他对于治天下的基本思路：治天下者必先得民心，知识分子是人民中的优秀者，所以能得士子之心，也就提纲挈领，可以左右民心的基本意向。他的建议为顺治帝所采纳。于是，顺治三年实行开科取士。

范文程也曾提出一些后来被广泛运用于文字狱中的建议。为了使清廷能够得到真正的人才，避免因朋党而招揽非才，范文程于顺治十一年上“保举连坐”之法，顺治帝诏从其议。保举连坐之法的具体内容是：部院三品以上大臣各保举所知的人才，不论满汉新旧，不拘资格大小，不避亲疏恩怨，只要是正直才守之人，即可保举，并将被保举者堪任何官，有何实绩等一一奏闻。将所举者姓名呈送皇帝，由皇帝不时召对，考察其议论、行事。如果有职位缺出，便可推出被保举者，与保举人姓名一起奏请皇帝裁决。如果用后称职，则以其成绩之大小，保举人一起奖励；如果不称职，则以其罪之大小，对保举人实行连坐处罚。

范文程的保举连坐法是针对汉代以来的察举制度的弊端而提出的。唐代以后，在提拔人才方面，察举可以作为科举的补充，它使道德品格高尚而文才不足者或在科场中失手的人才可以由较为直接的方式提拔。然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察举容易被徇私舞弊，或助长了拉帮结派。为了使保举出真正的人才，范文程通过规定保举者与被保举者之间的同奖同罚关系去达到制约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保举真才得到了保障。至于文字狱中的株连，实际上正是保举连坐法的必然延伸。

处于血腥镇压与政治诱惑的夹缝之中，顺治朝的文人们出现了激烈的分化。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一方面拒不与清朝统治者合作，另一方面，则面对天崩地解的历史巨变，站在

历史发展的宏观高度，反思、批判传统文化，思考传统的政治、文化制度对士·仕阶层的文化素质与价值追求的影响，提倡独立思考，提倡务实精神，呼唤着新的人文精神的降生。

钱谦益、吴伟业、侯方域则在夹缝中做出了各自的选择。从讲究诚信的儒家价值观念来看，钱谦益的降清，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普遍訾骂；然而，倘若以政客的社会角色去看待钱谦益，则可以对他的投机行为给予多一点的理解。吴伟业则痛苦地彷徨于夹缝之中。

在这样的夹缝中，有人一如继往地保持其“狂”的品性，如金圣叹，将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西厢记》、小说《水浒传》与《史记》、《离骚》等同列为才子书，在这些历来被视为海盗、海淫的文艺作品中发现了可贵的真性情；有人则游刃于夹缝之中，如李渔的戏曲、小说创作，以人们喜闻乐见的话题为题材，提出问题，又以人们愿意接受的方式解决问题，游刃于名教与风流之间。

分化之中，文人经受了价值选择上的痛苦煎熬；被分化的文人则创作出异彩纷呈的文艺作品，展示了各种各样的情感世界。

一 启蒙思潮

明王朝的灭亡，给士·仕阶层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这种震撼的实质常常为另一种表象所覆盖，这就是异族的入主中国。况且作为当时知识界的精英，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都有过不与异族统治者合作的行动，民族气节在当时是一种令人瞩目的政治伦理。然而，与其说黄宗羲等的反应是出于一种民族意识，毋宁说是出于一种文化意识，他们在天崩地解的历史巨变面前，对传统的专制政治、文化进行反思。这种文化反思与吴伟业等的忠节观念不同，后者始终拘囿于一家一姓的君臣伦理，而前者则对明朝灭亡的文化依据进行批判性反思，把明朝的灭亡视为一种文化的衰竭，而不是简单地视为改朝换代。它是一种启蒙主义，它将蒙昧主义视为传统的专制政治、文化必然走向衰竭的文化根源。他们反思的内容包括皇权、法制、民权以及人的独立思考的权利、教育的启蒙性等等，而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了反

专制、重个性这一核心。

王阳明的心学在明清之际的历史剧变中遭到了普遍的诟病，对心学的批判成为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起点。

阳明心学在明末清初由两个维度产生影响：一是“心即理”的命题，二是重内心体悟而忽略实务以致堕入空疏空谈。前一个维度促成了重个性、重性情的反理学的浪漫主义思潮，后一个维度导致了晚明的空谈风气，从而成为明王朝覆灭的文化心理基础。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一方面发挥重个性重性情的率性而行的浪漫主义思想，从而发展成为反专制的民主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他们面对现实，立足于现实，对正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冷峻的思考，对心学的空疏导致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从而升华为经世致用思想，务实的思想。这两个维度在明末清初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那里统一起来，成为传统封建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把明朝的灭亡归结为空疏的文化心态，这自然是不全面的。明朝的灭亡有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原因。正德、嘉靖等皇帝的荒淫无耻，宦官的擅权，吏治的腐败，贫富的悬殊，土地兼并的日趋严重，民族矛盾的日趋尖锐，市民阶层的日益壮大，成为明朝封建专制统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分化力量，所有这一切，使得貌似强大的明王朝迅速走向衰败，最后在多尔衮的强大军事力量面前不堪一击。

在程朱理学于明朝统治了二百多年之后，在明代中叶，其一统天下的局面终于为王阳明的心学所打破。晚明东林党人顾宪成在描述王阳明哲学所产生的时代影响时说：“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况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然！而此窍一开，混沌几亡，往往凭虚见而弄精魄，任自然而藐竞业，陵夷至今，议论益玄，习尚益下，高之放诞而不经，卑之顽钝而无耻。”^①

王阳明的心学提出“致良知”的思想。从“穷理”的目的上看，王阳明与程朱理学一样，都是为了体悟天理，确认封建专制主义的合法性。但他们“穷理”的方式不同。就程朱理学而言，一方面，它从

① 《小心斋札记》卷三。